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伯明翰学派的电视观

THOUGHTS ON TELEVISION OF BIRMINGHAM SCHOOL

王卓慧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王卓慧，籍贯陕西，2004年获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广播电视新闻方向硕士学位，之后就职于凤凰卫视，从事策划、编导、记者等工作。2010年考入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系，2013年获广播电视艺术学电视文化方向博士学位。现就职于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数字创意与动画学院，任影视制作专业专任教师。

责任编辑：程 彤 曲建文

本书策划：

封面设计：



人文在线
www.rwbook.com.cn



伯明翰学派的电视研究是包括从电视技术到电视形式、从电视符号到电视文本、从电视制作者到电视受众等涉及电视方方面面一个的庞杂体系。它的电视观念是进入文化研究中心的学者在几十年中各自的研究成果逐渐累积中构成，这些研究成果相互独立、各有偏重，但也有承继性和相关性。因此，本文根据伯明翰学派的成员对电视研究理论的贡献程度和影响程度，按照他们进入伯明翰文化研究中心的时间作为历时轴线，选择了雷蒙·威廉斯、斯图亚特·霍尔、戴维·莫利、约翰·费斯克等四位学者的电视研究理论分别进行个案研究。在个案研究的同时，本文也关注他们彼此之间的理论联系，并从中寻找出他们的共性。从个性和共性两个角度，达到理论创新。

伯明翰学派的电视观



本社微信公众号
(请用微信“扫一扫”)



本社淘宝旗舰店
(请用QQ“扫一扫”)



超悦读公众微信号



本超悦读微信群
群主审核身份后拉你入群

ISBN 978-7-5117-3097-8



9 787511 730978 >

定价：48.00元

目 录

引言	(1)
第一节 概念界定	(1)
一、伯明翰学派的界定	(1)
二、“文化研究”与伯明翰学派的关系	(3)
三、伯明翰学派发展的三个阶段	(4)
四、伯明翰学派电视观的研究意义	(4)
第二节 研究综述	(6)
一、国外研究概述	(6)
二、国内研究概述	(10)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18)
第一章 伯明翰学派电视研究生成语境	(20)
第一节 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遗产	(20)
一、法兰克福学派的历史渊源	(20)
二、法兰克福学派关于电视研究的理论资源	(21)
三、从法兰克福学派到伯明翰学派	(35)
第二节 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生成语境	(36)
一、伯明翰学派产生的背景	(36)
二、伯明翰学派的理论路径	(38)
第三节 伯明翰学派电视研究的生成语境	(42)
一、英国战后电视发展状况	(42)
二、英国战后电视节目概述	(44)
三、英国战后本土电视研究	(46)
四、美国经验学派的影响	(49)
第二章 伯明翰学派电视研究的理论奠基	(51)
第一节 电视的历史观：是技术的？还是社会的？	(53)
一、技术与社会	(53)

二、“流动的藏私”	(57)
三、对麦克卢汉的媒介决定论的批评	(60)
第二节 电视的效果观：为了什么目的？	(65)
一、对拉斯韦尔模式的批评	(67)
二、电视的效果	(69)
第三节 电视的形式观：流程	(73)
一、“流程”的文本意义	(73)
二、“流程”的现实意义	(75)
三、“流程”的学术意义	(80)
小结：雷蒙·威廉斯的电视传播观	(85)
第三章 伯明翰学派电视观的符号学解读	(88)
第一节 电视的符号观：编码/解码	(89)
一、传播学过程模式与“编码/解码”模式	(90)
二、“编码/解码”模式的符号学来源	(93)
三、“编码/解码”模式的符号学解读	(96)
第二节 电视的意识形态观：电视话语的意义	(99)
一、霍尔关于电视意识形态观的思想溯源	(100)
二、霍尔关于电视意识形态观的实践	(105)
三、“意识形态”的再发现	(112)
第三节 电视的接受观：受众解码的三个立场	(114)
一、霍尔的电视受众的三种解码立场	(115)
二、对霍尔电视受众解码立场的进一步阐释与思考	(117)
三、霍尔模式的意义	(119)
小结：霍尔模式与媒体研究	(124)
第四章 伯明翰学派电视研究的方法论	(127)
第一节 电视受众的民族志研究：莫利的“全国新闻”	(128)
一、受众研究的理论路径	(128)
二、伯明翰学派“民族志”方法的介入	(130)
三、莫利的“全国新闻”受众研究	(134)
四、对莫利“全国新闻”受众研究的评析	(138)
第二节 电视与性别：从莫利的“家庭电视”说开去	(140)
一、莫利的“家庭电视”研究	(140)

二、莫利“家庭电视”研究中的性别研究	(143)
三、电视与性别：伯明翰学派女性主义电视研究	(145)
第三节 莫利的“后民族志”时代电视研究	(152)
一、媒体研究中的电视消费理论	(153)
二、电视：在私人与公共之间	(157)
小结：莫利的新受众研究	(161)
第五章 伯明翰学派电视观的理论整合	(164)
第一节 费斯克电视观的大众文化理论语境	(166)
一、费斯克大众文化研究的理论溯源	(166)
二、费斯克的大众文化观	(169)
第二节 电视的文本观：生产性文本	(171)
一、电视文本的多义性	(171)
二、电视文本的特征：生产者式文本	(174)
三、生产者式文本的结构	(175)
第三节 电视的经济观：两种经济	(178)
一、电视的两种经济理论	(178)
二、两种经济：两种视角	(180)
三、两种经济的符号战场	(181)
第四节 电视的受众观：积极的受众	(185)
一、受众的主体性	(186)
二、受众的快感	(188)
三、“迷”与生产力	(195)
第五节 电视的功能观：行吟诗人	(197)
小结：费斯克电视研究中的民粹主义	(201)
第六章 伯明翰学派电视观的评析	(204)
一、伯明翰学派电视观的特色	(204)
二、伯明翰学派电视观的影响	(210)
三、伯明翰学派电视观的局限	(217)
余论：伯明翰学派的终结	(222)
参考文献	(224)
后记	(243)

引言

第一节 概念界定

一、伯明翰学派的界定

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是以 1964 年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简称为 CCCS）的成立而发端的，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art）担任第一任所长。自 20 世纪 70 年代起，该中心在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的主持下逐渐知名，其后影响日渐扩大，研究辐射到北美及澳大利亚，在 80 年代风靡英语世界，根据其研究方向和学术成果，学界称其为“伯明翰学派”（the Birmingham School）。

需要说明的是，“伯明翰学派”并不是随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与生俱来的一个称谓，CCCS 第二任主任霍尔曾说过“事实上并不存在伯明翰学派这样的东西”^①，因此可以说伯明翰学派是被后来的学者建构的概念。尽管伯明翰学派是一个较为松散的学术团体，他们没有统一的学术要旨，他们的文化研究在当时很大程度上并不被认为是具有传统意义的学科。但是他们总是将特定的文化现象纳入历史、社会、意识形态、阶级等更广泛的社会政治语境进行探讨，从而彰显出独特的学术气质。这也是为什么后人愿意将他们归为一类，并界定为“伯明翰学派”。

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成立伊始，主要培养研究生。但是研究中心却一反传统研究生教育模式，即授课、考试、颁发学位这样的程序，而是强调集体的研究成果并非个人的学术成就。研究中心鼓励研究生成立各类研究、读书小组，由各小组的成员共同决定各类研究主题，小组之间的人员也可以自由跨越。在每

^① Stuart Hall, “The Emergence of Cultural Studies and the Crisis of the Humanities”, October, 1990, vol. 53, p. 11.

年年终时各小组集合研究成果,对整个中心的师生提出报告以及互相辩论,最后的成果发表于研究中心所出版的《文化研究论文集》(Working Papers in Cultural Studies)中。由于在结构上,打破了师生之间的刻板关系,因此在研究的主题上更显得包罗万象:举凡工人阶级的文化、亚文化群体的形成、大众文化、知识社会学、女性主义等等都是文化研究跨出研究脚步的尝试。^①有人认为,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中心内部与周边学者开展的研究构成了英国文化研究的经典时期,其间不仅有重要著作出版,也形成了关键的理论模型。

由于伯明翰学派历时近四十年^②,囊括的学者众多,所涉学科繁杂,因此国内对于伯明翰学派的界定也多种多样。从事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黄卓越教授在一次访谈中指出“哪些成员该属于伯明翰学派首先应看其与伯明翰学派之间实际发生的关系,”其次还“要看他们的主导性思想脉络是否一致”^③。在此基础上,胡疆锋博士在其博士论文《亚文化的风格:抵抗与收编》中,对伯明翰学派的谱系进行了较为清晰和完整的界定。胡疆锋认为伯明翰学派的成员构成主要有两类“第一类是在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工作、学习过的成员。^④第二类是虽然没有在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学习和工作过,但与伯明翰学派有很深学术渊源的学者,他们或极大地影响了伯明翰学派,如雷蒙·威廉斯

① 陈光兴《媒体/文化批判的人民民主逃逸路线》,台北:唐山出版社1992年版,第142—143页。

② 从1964年中心成立到1974年霍加特正式辞职的10年间,中心的全职教员始终只有霍尔和霍加特两个人。1980年霍尔离任时,中心在读的硕士和博士生多达40人,但正式教员始终只有3人。1979年,理查德·约翰逊(Richard Johnson)继任后开创的历史研究给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带来了新的研究方向和影响。90年代以后,乔治·拉朗(Jorge Larain)在官方的压力下将文化研究中心与社会学系合并,成立了文化研究社会学系。至此,文化研究从研究生课程扩大到本科教学的领域。2002年,由于种种原因,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与社会学系遭到校方的解散,伯明翰学派遂走出历史舞台,但其掀起世界领域的文化研究热潮并为退去。

③ 黄卓越、邹赞《追述与反思:伯明翰学派与文化研究——北京语言大学博士生导师黄卓越教授访谈》,《社会科学家》2009年第7期,第4页。

④ 包括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历任主任霍加特、霍尔、约翰逊和拉朗;还包括那些被称作“伯明翰帮”(Birmingham Mafia)的在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毕业的硕士和博士,主要有:菲尔·科恩(Phil Cohen),托尼·杰斐逊(Tony Jefferson),保尔·威利斯(Paul Willis),迪克·赫伯迪格(Dick Hebdige),安吉拉·麦克卢比(Angela McRobbie),劳伦斯·格罗斯伯格(Lawrence Grossberg),约翰·克拉克(John Clarke),戴维·莫利(David Morley),保罗·吉尔罗伊(Paul Gilroy)等。

(Raymond Williams)；或曾经参与过伯明翰的学术活动与经典文本写作的学者，如约翰·费斯克（John Fiske）和托尼·本内特（Tony Bennett）等。”^①

二、“文化研究”与伯明翰学派的关系

从文化研究的发展来看，所谓的英国文化研究（British cultural studies）主要指二战后在英国所发展出来的知识传统，但它的发源可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以来，英国一连串复杂的历史经验之间相互的影响。可以说，英国文化研究并不完全等同于伯明翰学派。英国文化研究的内部差异性很大，伯明翰学派、莱斯特学派和卡迪夫学派同属文化研究，但各自偏重不同。黄卓越教授也曾指出“如果我们扩大一些视野，就会消除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神话’，……例如，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处于鼎盛的‘银幕派’理论因为其以结构主义为阐述特征，因此可看作是文化研究的一个分支，但是它与伯明翰学派没有隶属关系”^②。也就是说，它也是冠以“文化研究”名义下的一个理论派别，伯明翰学派与它是平等的关系。另外，八十年代后，文化研究快速渗入各个领域，并扩展至美国、加拿大与澳洲等地，“文化研究”对于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特指含义有所弱化。

然而在学术建制上，文化研究则始于1964年伯明翰大学成立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简称CCCS）。“文化研究”这一名称最早也是霍加特在建立CCCS时提出的。从那以后，文化研究中心成为英国文化研究知识汇流之所，并发展出别具特色的研究取向，这些都奠定了伯明翰学派的基础，也使得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成为“文化研究”的代名词。有学者将CCCS最辉煌的学术时期，即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称为“伯明翰文化研究”时期。

其次，由于“文化研究”是在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生根发芽，并在世界学术界里起到了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因此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已经成为一个品牌，也有学者称伯明翰学派为“文化研究学派”。

另外，从概念意义上讲，陆扬先生在《文化研究导论》一书中指出，“文化研究”，英文为cultural studies，指的就是被人引经据点的“伯明翰学派”；“文化的研究”，则是the study of culture，包括了许多思想运动及学术传统，比

^① 参见胡疆锋《亚文化的风格：抵抗与收编》，首都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第9—10页。

^② 黄卓越、邹赞《追述与反思：伯明翰学派与文化研究——北京语言大学博士生导师黄卓越教授访谈》，《社会科学家》2009年第7期，第4页。

如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心理分析、社会学等，都是全人类文化研究的一部分。因此，“文化研究”与“文化的研究”也被认为是狭义与广义层次上的区别。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即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是“文化的研究”的核心和动力。从陆扬先生的观点来看，“银幕派”理论显然属于“文化的研究”的一部分。本论文使用陆扬先生的概念，也就是狭义的文化研究概念，提及“文化研究”特指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

三、伯明翰学派发展的三个阶段

伯明翰学派以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霍加特、威廉斯、汤普森等学者的出现为标志，源于他们对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和利维斯（F. R. Leavis）文化保守主义传统的批判，英国文化研究的历程就此拉开帷幕。在这一时期，被称为文化研究的“文化主义”，它的特点是对大众文化的积极颂扬。

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在 1964 年成立，是伯明翰学派的正式崛起的标志。七十年代，在第二任主任霍尔的主持下，CCCS 发展成为举世瞩目的新理论中心。此时由于经历了法国“五月风暴”以及随之而起的妇女、种族运动等一系列社会动荡，CCCS 的研究重心从先前的工人阶级转移到了青年亚文化和媒介研究。在这个时期中，受到结构主义的冲击和著名的“葛兰西转向”，结构主义与文化主义两种范式在伯明翰学派这里得到融合，文化研究进一步得到推动。

从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CCCS 的研究比前两个阶段更为多元，消费主义、“快感”理论、文化身份等与后现代密切联系的主题得到关注，对文化的思考也更加复杂与深入，出现了总结性反思与开拓性重构并行的局面。^①

2002 年 6 月，根据伯明翰大学实行的末位淘汰制评估体系，由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改制的“文化研究与社会学系”因为没有达到学校要求的分值而被关闭。作为实体，伯明翰学派不复存在。

四、伯明翰学派电视观的研究意义

从电视发展的历程来看，电视一经诞生，就迅速俘获了大量受众，并超越媒介史上各种媒介形态，一举成为最具影响力的媒体，即使在今天受到新生媒介——网络的冲击，它依然展现着顽强的生命力。那么，在媒介江湖风起云涌

^① 参见黄卓越等《英国文化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1 年版，第 272—274 页。

的表象下,电视是如何吸引受众的,它背后隐含着什么样的力量,它通过什么机制发挥影响,而受众如何解读电视,依据什么理解电视,这种种的疑问直到现在也依然值得研究与思考。

“在二十世纪70年代以来,从社会理论与文化研究层面上对电视媒介进行研究,伯明翰学派被认为是最为成功者”^①。他们一改传播理论的线性模式,认识到受众解码的复杂性,并给予了积极评价,他们创造了电视受众研究方式的新思路,将日常生活实践领域引入了电视理论的研究。

诚然,电视研究并不能算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终极目标,电视作为大众文化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只是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一个必经途径,就像美国传播学者劳伦斯·格罗斯伯格所说,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是对政治、文化、理论和脉络一种独有的进路,它可以容纳很多不同的理论、政治和方法的派别,但你大概也知道,我认为文化研究的企图是一种颠覆性地脉络化的做法,它是对脉络的脉络化理论……文化研究关注的是脉络,而不是电影、电视、流行音乐,或其他东西,虽然那些东西是进入了解脉络的方法,但不是关注点。”^②然而,伯明翰学派通过电视研究在构建文化研究的理论大厦的同时,也积累了丰富的电视研究成果,“甚至可以说,在所有电视的知识领域里,伯明翰学派的影响最大”^③。这也是为什么对伯明翰学派的电视思想做一系统研究的必要性。

从实践角度讲,无论当代电视的技术如何突飞猛进,当代的电视形态如何日新月异,我们都可以回到电视研究的理论源头,寻找到观望当下电视研究的理论资源。因此尽管伯明翰学派的电视研究多是上世纪的理论成果,但是伯明翰学派将电视放在了一种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语境中来研究,广泛吸收了符号学、意识形态等理论资源以及民族志的研究方法,最终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学术机制和话语体系。这些对当今的电视研究都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但是国内外对于伯明翰学派电视研究的专著还非常有限。在世纪之交时,伯明翰学派文化理论的影响才传到中国。彼时的中国在经历了上世纪八九十年

① 王臻 《伯明翰学派电视研究概论》,《甘肃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4年6月卷,第34页。

② 格罗斯伯格、冯应谦、陈韬文 《文化研究往哪里去》,《传播与社会学刊》(香港),2009年第10期。

③ 易前良 《美国“电视研究”的学术源流》,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66页。

代以精英文化为主导的轰轰烈烈的美学热和文化热之后，市场经济得以推广，消费社会日渐形成，大众成了主人，以大众文化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伯明翰学派自然受到了学界的关注。经过十余年的理论发展，关于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专著与论文可以说是汗牛充栋。但是在诸多关于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引荐与评述的著作中，伯明翰学派的电视研究多见于其中一个章节或是零星的论文中。直到目前为止，国内外还没有将伯明翰学派的电视研究作为独立研究主题的专著。本选题《伯明翰学派的电视观》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希望能对伯明翰学派的电视研究理论进行系统的梳理与评析，进而能够填补一个小小空白。

第二节 研究综述

一、国外研究概述

伯明翰学派作为文化研究的重镇，他们在文化研究领域的理论硕果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就受到了西方学者的重视。然而如上节所述，伯明翰学派并不是自从诞生就被冠以的名称，而是在之后的学术发展中逐渐开始被学界使用的一个称谓。笔者以“the Birmingham School”（伯明翰学派）为关键词在美国国会图书馆（Library of Congress）和大英图书馆（the British Library）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the Library of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的网站检索，效果并不理想，多是包括“伯明翰”和“学院”的一些无关结果，而且没有找到以本文特指意义的“伯明翰学派”为主题研究的著述，更不用提以“伯明翰学派”和“电视研究”为关键语汇的检索了。其次，笔者将概念延展一下，以“cultural studies”（文化研究）和“television”（电视）为关键词进行检索，由于“文化研究”从时间到地域到内容都涵盖颇广，因此检索的结果包括了来自美国、澳大利亚和英国等多国的从后现代、后殖民主义到性别与儿童等内容繁杂的书籍，也没有专门以“文化研究”和“电视”为研究对象的著述。经过笔者的梳理，发现伯明翰学派的电视观或电视研究多是以某一个点、某一个章节出现在一些关于文化研究、媒介研究、传播研究和电视研究的著述中，本文在这里选择代表性的罗列一二。

由格雷姆·特纳（Graeme Turner）在1990年编著的《英国文化研究导论》（British Cultural Studies: An introduction）受到业界一致好评，目前已两次修订再版，约翰·斯道雷（John Storey）在第三版指出“本书是并且仍然是第一本及最

好一本介绍英国文化研究的著作”^①。《英国文化研究导论》主要以浅显易懂的方式对英国文化研究的理论、理论家及其主要观点和概念做了梳理，对英国文化研究做了一个概要介绍，尽管有些浮光掠影，但多多少少包括了伯明翰学派在电视研究中涉及的概念与理论，比如：文本、受众、民族志、意识形态等。特纳最终指出文化研究的实践是“必须揭示我们视为理所当然的影像、声音、姿态背后的意义”^②，这也与伯明翰学派引入符号学和“霸权”理论来阐释电视问题的目的是一致的。但本书终究是以文化研究为主题的入门级读物，关于电视研究的内容还必须从中抽离并以电视研究的角度再次深化。

在菲利普·史密斯（Philip Smith）所著的《文化理论——导论》（*Cultural Theory: An Introduction*）一书中，专门开辟章节对英国文化研究做了介绍，并着重阐述了伯明翰学派。他认为伯明翰学派构成了英国文化研究的经典时期，形成了关键的理论模型，指出“这些成果中有很多都是合作完成的，这反映出了 CCCS 社群主义的准则，也体现了一种真正的群体归属感”^③。他引用了霍尔在探讨电视传播研究背景下形成的编码/解码理论，对伯明翰学派的“大众媒体的文本研究”做了论证，指出这类研究的目的是确定观众“抵抗”支配性信息的能力；他引用了霍加特和威利斯的民族志研究，说明伯明翰学派对边缘群体生活方式的重视，并试图诠释他们的世界；他还引用了霍尔的《监控危机》来论证伯明翰学派在葛兰西转向中是如何解释意识形态支持统治阶级利益的方式。同样，这本书对伯明翰学派的理论有了轮廓性质的介绍，电视的观念只是星星点点见于其中而已。

尼克·史蒂文森（Nick Stevenson）在《认识媒介文化：社会理论与大众传播》（*Understanding Media Cultures*）中提出了大众传播研究的三种范式。伯明翰学派的威廉斯、霍尔的电视与传播理论以“批判”的研究范式被归为“马克思主义与大众传播研究”一章，史蒂文森指出尽管威廉斯和霍尔的观点有过分强调意识形态凝聚力的倾向，但是“霸权和意识形态等概念对理解信息

① Graeme Turner, *British Cultural Studies: An introduc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Back cover.

② Graeme Turner, *British Cultural Studies: An introduc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p. 231.

③ Philip Smith, *Cultural Theory: An Introduction*,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01, p. 154.

时代依然重要”^①。伯明翰学派另两位主将莫利与费斯克分别对电视受众的研究和通俗文化的研究被史蒂文森列入了受众研究范式，史蒂文森指出莫利以霍尔的编码/解码模式为基础，更加专注电视收视语境本身，而费斯克的论述则汲取了文化研究的理论给养，提出受众的游击性活动，是对权力统治集团的一种抵抗方式。同女性主义与心理分析一道，史蒂文森想要说明“受众的主观性是通过与存在着的某些物质性条件的互为作用与各种象征性形式而得以构建”^②。可以说本书提及了伯明翰学派相关的电视研究，但大都拆分开来服务于史蒂文森自己的理论体系，而忽视了伯明翰学派电视研究本身的系统性。

隆·莱博（Ron Lembo）的《思考电视》（Thinking Through Television）一书中在“电视使用的概念”这一部分以“文化研究”为小标题简明扼要地评述了伯明翰学派关于电视权力的观念。莱博认为伯明翰学派尽管是跨学科的，但还是存在着共同主题，那就是文化研究中“话语的权力”。伯明翰学派以此为电视研究打开了一扇大门，从而说明“意识形态统一性背后规范影响的多样性问题”以及电视“如何给予某些意识形态和话语以特权”^③。在莱博看来，伯明翰学派与别的社会理论家和社会科学家不同的是，他们以批判的态度对电视提出了更具体、也更困难的问题，比如社会权力如何在日常生活中真正发挥作用？在实践意义上，霸权意味着什么？等等。莱博通过讨论“话语”、“文本”和“话语实践”这几个概念分析了伯明翰学派电视权力观及其局限性。可以说，莱博触摸到了伯明翰学派电视观的精髓，但分析得过于简要，只是点到即止，提出了许多问题，但无意解决问题。

尼古拉斯·阿伯克龙比（Nicholas Abercrombie）在《电视与社会》一书中，从电视文本、电视制作和电视观众三个方向讨论电视与社会的关系。在这三个部分中，他都或多或少地提到了伯明翰学派的电视观。比如，在电视文本部分，他指出电视尽管被威廉斯所谓的“情感结构”和文化价值观以“流程”的形式整合起来，但零碎的特性是电视固有的特征，“流程”实质上贯穿于各个电视片断中；在电视受众部分，他认为莫利为证实霍尔模式而将观众依据他们在社会关系中的位置把他们的反应分为支配式、协商式和反对式，然而“这些反应方式疏远、参与的过程或批评性、参照性框架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根本不

① Nick Stevenson, *Understanding Media Culture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5, p. 46.

② Nick Stevenson, *Understanding Media Culture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5, p. 77.

③ [美] 隆·莱博 《思考电视》，葛忠明译，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65—66页。

是直截了当的”^①。由于本书是面向大众传播研究和文化研究专业方向的一部教材，因此囊括了众多学者的观点，伯明翰学派的电视观被淹没其中。

还值得一提的是约翰·费斯克的文章《英国文化研究与电视》，这篇文章被选登在罗伯特·艾伦编著的《重组话语频道：电视与当代批评理论》（第2版）中。费斯克首先详尽地介绍了文化研究对结构主义的纳入、对阿尔图塞的意识形态接受到葛兰西转向的理论路径的发展，继而在此基础上探讨文化研究对于电视的关注。文章认为霍尔的编码/解码首次提出“电视节目含有的不是单一意义，而是相对开放的文本，能够被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解读”^②，因此被视为英国文化研究的转折点。费斯克继而从与主导意识形态的关系角度解读了霍尔提出的三种解码方式以及莫利对其的论证，并纳入了性别与族裔的因素，说明电视文本就是话语，意义是相对的，文本与社会制度的关系才是恒久的。在总结呈词时，费斯克依然回到文本这个出发点，认为电视文本是意义的潜在场所，而文化研究就是揭示电视文本是如何成为意义争夺的场所的。费斯克提纲挈领地概述了英国文化研究在研究电视时的理论基础与主要内容，为了解伯明翰学派电视观打开了一扇门。

此外，John Storey 的著作《文化消费与日常生活》^③（*Cultural Consumption and Everyday Life*）和《文化研究与大众文化研究：理论与方法》^④（*Cultural Studies & the Study of Popular Culture: Theories and Methods*）、Jeff Lewis 的著作《文化研究》^⑤（*Cultural Studies: the Basics*）以及 Horace Newcomb 的文章《电视研究的发展历程》^⑥（*The Development of Television Studies*）、Doug Kellner 的文章《以批判的角度审视电视：从法兰克福学派到后现代主义》^⑦（*Critical Per-*

① [英] 尼古拉斯·阿伯克龙比《电视与社会》，张水喜、鲍贵、陈光明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72页。

② 约翰·费斯克《英国文化研究与电视》，见[美]罗伯特·艾伦《重组话语频道》（第2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92页。

③ John Storey, *Cultural Consumption and Everyday Life*, London: Arnold, 1999, p. 77—97.

④ John Storey, *Cultural Studies & the Study of Popular Culture: Theories and Methods*,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Ltd., 1996, p. 9—28.

⑤ Jeff Lewis, *Cultural Studies: the Basic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 Ltd., 2002, p. 109—142, p. 260—267.

⑥ Janet Wasko, (ed.), *A Companion to Television*,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05, p. 15—28.

⑦ Janet Wasko, (ed.), *A Companion to Television*,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05, p. 29—50.